

预警

YUJING 蔡哲远◎著

当前，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在盛世繁荣背后亦面临种种隐忧，如新体制所创造的增量财富不足以化解旧体制“黑洞”所制造的存量风险，未来坠落的可能不是美国鹰，而是中国龙。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是对“中国智慧”的考验。改革未竟全功，国人仍需努力。“保持饥饿，保持愚蠢”，继续奋斗，才能续写下一个30年的光荣与梦想。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预 警 中 国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预警中国 / 蔡哲远著. --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80688-631-1

I. ①预… II. ①蔡… III. ①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1407号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 项新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邮编: 300191

电话/传真: (022) 23366354

(022) 23075303

电子信箱: www.tssap.com

印刷: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 1000毫米 1/16

印张: 14.5

字数: 190千字

版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做多”中国抑或“看空”中国？历史岔口之“双城记” / 003

20世纪之于中国，犹如春秋大梦，衰败、崩溃、自我否定、重建、受挫、再重建贯穿这“极端的年代”。为探求适于自身的发展道路，中国进行了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制度实验，亦曾为此付出高昂代价，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沧海桑田，历经误读、解构与重构，演绎出一幕幕“双城记”。诸多曲折，正是一个后发大国在世界丛林中艰难突围实现文明转型全部复杂性的反映。在21世纪开局之际，中国终于彻底走出时代的歧途。

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台北，犹如一根藤上结的瓜，并在不同维度上互构“双城”——“她者”的关系，其兴衰荣辱，恰是一个时代的镜像，并互为制度意义上的参照系。从北宋的开封到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到巴黎、伦敦、纽约、东京到香港、新加坡、上海，恰是这个千年世界“权力的转移”。

政经·民生篇

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公民意识充分觉醒并深具“DIY精神”的一代，他们信奉“我的地盘，我做主”、“做最好的自己”、“大狗小狗都要叫”，尽管也不乏“睡着的，昏着的，躺着的，玩着的……”

以及那种“一心要过别人的生活”的不自信与“单向度”消费主义的贫困。作为这个古老国度的异质性“增量”，假以时日，在引领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新生活风尚的同时，他们可能在根本上重塑这个国家的性格，缔造一个名副其实的“新新中国”！是的，“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历史就在我们希望立足的地方等待着”！

北京离“首善之都”有多远 / 025

何为大国？不妨听听美国第36任总统林登·约翰逊的说法：“我无意去做一个兴建帝国、追求荣耀和扩大版图的总统。我愿意做这样的总统：教育孩子，扶贫救弱，保护每一个公民在所有选举中的选举权。”此谓“伟大社会”的梦想。何为大都市？其标志也决不在于拥有“世界第一区政府”之类的豪华政府大楼，而是看它是不是让普通市民、小贩、流浪汉乃至乞丐也过得快乐，此谓“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精英与民众莫于傲慢与偏见中误读 / 030

以中国之大，问题之多，更多的还是有赖于像取消农业税这样具制度变革意义的“善政”，而这正需要像茅于軾先生这样具有一定政策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像“为富人说话”一样“为穷人说话”。其

实，即使“为富人做事”亦无不可，前提是遵循规则、确立公私的边界与“防火墙”，即绝不能因一己之私以自己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影响宏观经济参数的制定。此外，亦完全可以将“为富人做事”所获收益用于“为穷人做事”，只可惜这样真正具有企业家能力及意愿的经济学家恐怕不多。

我们不需要有选择的“数目字管理” / 033

西方经济学界有一句格言：“大概的对比精确的错可取。”当我们的经济学家们郑重其事地在那儿为“七上八下”的GDP增幅争得面红耳赤时，人们不禁要问：尚处于粗放型发展模式的中国经济真的复杂到需要争论小数点后一位的程度了吗？更让人难以理解的则是诸如72.3%这样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的现代化程度以及精确到年的现代化时间表。

事实上，一些政府官员早已无师自通地学会如何在“中国国情”与“国际惯例”间游刃有余，以及在“数目字管理”上的选择性利用（说得严重点，是在“忽悠”民众）：当需要人均GDP标榜现代化程度时，就以户籍人口为统计基数，完全无视数百万外来人口的贡献；对于政绩浓墨重彩洋洋万言，财政预算则“宁粗勿细”惜墨如金犹如“天书”。

警惕公权的破坏性“创造”扼杀公民的“创造性破坏” / 037

公权的破坏性“创造”越泛滥，公民“创造性破坏”（熊彼特语）的企业家精神将越萎缩。如果任由权力的触角自我扩张，不对其基于自由裁量权的寻租、设租作严格限制，窒息的将是整个社会的活力。

“高官厚禄”或为戏言，阳光工资则是亟须 / 041

“学而优则仕”曾为中国文人奉行了数千年之久，但官员规模一旦膨胀到国家财政难以承受的程度，就可能导致社会危机。现代社会理应是一种“多中心秩序”，如果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争挤官场“独木桥”，并被体制迅速同化，岂非造成最大的人才浪费？

高等教育“压缩式现代化”与产业结构的张力

——探求大学生就业难之根源 / 045

这种“高增长、低就业”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中国的失业在很大程度上呈总量性失业的特征（当然，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及“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这种局面有望逐渐得到改善）。在“大学生与农民工的工资有趋同趋势”、彼此存在某种替代效应的情况下，如果大学生都“转变观念”、“放下身段”，将农民工的活全包了，

农民工的失业率恐怕就会大增。原因无它，合成谬误也。

与13亿的人口基数相比，中国大学生的数量仍然太少，无论如何都应是宝贵的人力资源而不是人口负担。问题在于，与高等教育因放宽“入口”而获得规模上的“压缩式现代化”相比，与就业这一“出口”相关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却缓慢而艰难得多。

他们的问题与我们的问题 / 049

“语境”至关重要，他们的丑闻不是我们的遮羞布。美国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化“危”为“机”的制度建设史。正是“乌鸦文化”的自我“体检”机制避免了现代商业文明肌体的畸变，今天美国再次病了，但社会整体无虞。我们的“喜鹊文化”却可能导致问题积重难返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如新体制所创造的增量财富不足以化解旧体制“黑洞”所制造的存量风险，未来坠落的可能不是美国鹰，而是中国龙。

《劳动合同法》的落实需要一场“伟大的博弈” / 052

且不论其意欲“捍卫”的“自由市场”在中国并不是一个现实存在（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价格在很大程度上被政绩驱动下热衷于招商引资的官员人为压低，而那些被曝光的“血汗工厂”老板身上可又曾有奥地利学派所强调的“千百年来从传统、社会、家庭的教化中

习得的自然正义和责任伦理”？），即便是一向信奉自由市场理念的美国，也早在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中就确立了最低工资标准。

这种担心因《劳动合同法》及最低工资标准制度患上“福利国家病”从而影响国际竞争力的想法，颇有点一个刚解决温饱的穷人却担心“富贵病”的意味。

房地产业或将步入“反省季”？ / 059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古人的智慧，其中就蕴含着“生态圈”的朴素思想。毫无节制的暴利，无异是对“青山”这一“生态圈”的破坏，而其恶果亦已凸现：在多年的“乱砍滥伐”之后，房地产商突然发现自己正面临“没柴烧”的窘境。“如果你要有个将来，那将会是与他人在一起的将来”，中国房地产业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无疑需要一个更和谐的产业链和“生态圈”的重建，而这也许还需要一系列体制变革意义上的努力，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房地产商的口诛笔伐上。

“明天之后，你会在哪里？”这是美国灾难片《后天》中的一句经典台词，意在警示人们任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必将遭受惩罚，这对房地产业来说似乎同样适用。冬天通常是内敛的季节，同时也是内省的季节，在接下来的这个冬天，经历了“黄金十年”高速扩张的中国房地产业是否亦将在步入“反省季”的同时完成自我的救赎？

钢市：告别“沸点”？ /071

对以“脊梁”自诩的中国钢铁业而言，美国钢铁业的衰落无疑是一个令人震撼的警示。与贸易保护的“最后晚餐”相比，以钢铁意志进行彻底的结构调整，才是中国钢铁业的真正自我救赎之道。

社会篇

今天的中国，正经历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复合转型，在“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下，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所形容的“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的财富马拉松正在这里上演。在某种意义上，这亦是一个如日本知名教育学者佐藤学教授所说的“在‘压缩式现代化’背后潜藏着的病理一举喷涌的时代。”

我们时代的抑郁与癫狂 /083

在这样的“断裂”社会中，强者与弱者在傲慢与偏见中彼此误读，人们既没有共同的情感，甚至也没有共同的时尚。就像托马斯卡

莱尔所说的，金钱是这个社会唯一的连接点。与此对应的是，我们正面临一个1亿多人患有各种精神障碍疾病的社会。

今天，你不知情了吗 / 087

康德主张“我们必须推拒知识，为了给信仰留出地盘。”索尔仁尼琴则认为：“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如将知情权归于积极自由的范畴，“不知情权”则属免于被垃圾信息所困的消极自由。

生活本身的艺术化曾是中国文化中令人迷醉的一面，如今却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烟消云散。在“更快、更高、更强”的迫力下疲于奔命、为信息焦虑症所困的人们，不妨尝试当一回“拒电族”，正如一句广告语所说的：“生命就应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其实，你有权不成功 / 091

“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苏格拉底如是说。正如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独一无二的你，DIY自己的人生吧。正如哈耶克所言，一个“伟大社会”应鼓励一切个体在一切可能的方向探索。我们迫切需要为成功祛魅的“成败相对论”：当本是自由创造副

产品的成功蜕变为一种奴役自由的“主流”意识形态，你有权大声唱出“我的失败与伟大”；在所谓的“成功人士”面前，你无须自惭形秽，成功并非你的义务，不成功则是你的权利，是一种可能生活，只要你心中仍有爱、诗意与梦想。当你无法抵御成功学这颗“伟哥”的诱惑“一心要过别人的生活”时，不妨以一所木工学校的校训自勉：“我们不认为一个平庸的博士比勤劳敬业的木匠对社会更重要”，抑或想想莫利（C.Morley）的话：“只有一种成功，那就是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

“富二代”：继承、超越抑或“垮掉”？ / 096

在我们这个缺乏连续商业史的国家，历史上的“老钱”们像割韭菜一样被一茬茬割光了，而那些30年前“洗脚上田”的新富们发现自己在教育“富二代”时正面临“穷人教育富人”的尴尬。与美国当年“垮掉的一代”相比，一些中国“富二代”似乎更热衷于以“炫耀性消费”（飙车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视为一种另类的炫耀方式）来填补内心的空白。

“富二代”继承了父辈的DNA，甚或亦继承了父辈的人脉资源和商业网络，却未必能继承父辈的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家能力。

为了避免因“万能”的金钱（及背后的权势）可能给子女带来“罪与罚”的“诅咒”，一些“富一代”是否亦应反躬自省，早日走出财富伦理上的“荒野”？

每个遇难者都有自己的名字 / 105

也许，在宏大叙事的视野中，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是“历史的小数”，然而，他们同样爱过、哭过、挣扎过、梦想过、奋斗过，有过自己的故事，并在人生的最后一刻成了生命抗战的英雄。

在这个因社会转型的巨大离心力而日益只有“共同的时尚”的时代，关于汶川的记忆理应成为我们民族共同体“共同的情感”。向死而生，在一个缺乏宗教资源的世俗国度，哭墙或将承担精神圣地的重任。倘若说“多难兴邦”，那么哭墙将既是一个民族悲情的寄托，也应是一个民族奋起的源泉。

“一切皆可能”与“一切皆可疑” / 109

塑造这种集体性投机心理的因素是复杂的，一个精辟而刻薄的说法是：“对于西方人来说，赌博和娱乐与概率有关，而对中国人来说，赌博是一场与命运的战争。”

什么样的市场，造就什么样的企业家。“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吴英神话在新春来临之前破灭，如能以此为契机，除旧迎新，再造商业生态与社会环境，或将告别“一切皆可疑”的时代，迎来一个真正的“一切皆可能”的时代。

从“伪虎门”看“网络共同体”的兴起 / 113

那种以对民众智商极度蔑视的心态，妄图玩弄真相于股掌之间的做法，完全低估了一个由各行各业的专业网友组成的“网络共同体”以其特有的“DIY精神”寻求真相的意志及掘地三尺的颠覆性技术力量。从纯粹的技术角度看，这样一场web2.0对前网络时代的战争，其胜负结局从一开始就已注定。

文化篇

“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的一个观点早已被广泛认可：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最难替代和模仿、最持久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作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无疑具有极强的外部性，大而言之，关系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升级、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现，也关系到一个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倘若因缘际会，也许进而推动一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亦未可知。

“黄昏时的树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就任何商业都基于一

定的生活方式这个意义而言，文化正是商业之根，如果一味陷入“单向度”的消费主义，终将成为无根的“漂一代”！如果说在“美国梦”的语境中，人生意味着“为了梦想和兴趣而展开的表演”，“经济动物”的称谓里则依稀可见“日本梦”的影子，那么，我们又将拥有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梦”？伴随这一代人中国意识的觉醒，中国的崛起和复兴背后又孕育着什么样的文化信息？

30年的积淀，是时候了！如果说基于人口红利的“八亿件衬衫换一架空客380”构成了过去30年“中国梦”的平实底色，那么，让我们期待，文化创意之光为下一个30年的“中国梦”映出玫瑰般的绚丽色彩！

重温阿信，继续奋斗，续写下一个30年的光荣与梦想 / 121

从《阿信》到《奋斗》，30年沧海桑田，不变的是“永恒相信”：“永远相信未来，相信远方。”“从绝望的山崖中凿出一块希望的石头”，深受阿信故事影响的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常引用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中的名言。发轫于30年前的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不也正是“从绝望的山崖中凿出一块希望的石头”吗？

今天，为走出“失落的10年”的阴影，日本这个深具危机意识的民族正进行自明治维新以来最深刻的结构性变革。零售业巨头八百伴总裁和田一夫（其母亲和田加津正是“阿信”的原型）破产后以70岁的高龄从零开始选择互联网重新创业的故事，或正是其中的一个缩影。相比之下，30年的高速增长，一种“成为自己的崇拜者”（奈保尔语）式

的轻佻气息开始弥漫于中国社会。改革未竟成功，国人仍需努力。值此改革30周年之际，“保持饥饿，保持愚蠢”，重温阿信，继续奋斗，对于续写下一个30年的光荣与梦想，当不无裨益。

中国文学：大时代为何缺少大作品？ / 127

在著名词作家乔羽看来，没有“大家”的时代不算是大时代。对于中国作家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作家再荒诞还不如我们的现实生活荒诞，作家再高尚还不如现实生活中的东西高尚”（余华语），这样一个“大时代”无疑为中国作家提供了比巴尔扎克、狄更斯更丰富的素材。然而，对于中国作家来说，“这也是最坏的时代”。今天的中国，经济学无疑是“显学中的显学”，经济学家成了这个时代最权威的发言人，文学则显然“边缘化”了。殊不知，在全景式地展现一个时代上，文学实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

中国作家的三重贫困 / 131

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图书出版业就像16世纪的手抄业。中国GDP规模大致为美国的1/5，按购买力平价则为美国的一半多，而在个人财富上，中国作家首富余秋雨却不及全球作家首富罗琳的1/500，背后隐含的正是中美两国出版业及经济社会结构的差异。与美国那种强大而成熟的畅销书工业体系相比，我们几乎还停留在手工作坊阶段！